

# 1941年湖南常德的细菌作战

[日]松村高夫

松村高夫,男,1942年生,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 一、前言

1952年,就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向朝鲜和中国撒布细菌一事进行调查的国际科学委员会,即ISC<sup>[1]</sup>,在其报告书(同年8月31日)中,谈及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实施的细菌战,指出,从1940年至1944年期间曾向中国的11个城市发动了细菌攻击。其中最为其重视的是1941年11月对常德的攻击。ISC将有关常德鼠疫的陈文贵报告(下文详述)作为附录收录在调查报告中,并在朝鲜会见了鼠疫专家,就是在常德进行现场调查并写出报告的陈文贵本人。陈文贵为了调查美国所使用的细菌弹,被派往平壤协助“朝鲜的防疫工作”。陈就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实施的细菌战,向ISC进行简要说明之后,又指出:目前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细菌武器的技术,和日本曾在中国使用过的“极其相似,而且规模更大”,证实了同一疫蚤技术也用于朝鲜,并断言目前所获得的“各项结果,说明了美国为什么有意图地将日本细菌战犯庇护起来的理由”<sup>[2]</sup>。他揭示了战后美国不追究731部队有关人员的战犯责任,而作为交换条件,为了将来使用细菌武器,将该部队的“研究成果”悉归已有的意义。

## 二、日机向常德投放鼠疫细菌

现在已发现关于日军细菌战的史料,日军在常德从飞机上撒布鼠疫菌的事实业已查明。1941年8月11日到南京的井本熊男中校,根据杉木参谋的指示,下令于9月16日发动向常德撒布细菌的作战。<sup>[3]</sup>担任此次作战指挥的大田澄,曾担任731部队的细菌实验部长(第二部),1941年7月刚被调任华中防疫给水部(一六四四部队)部队长。从石井部队派来40至50人,而参加作战的总人数约为100名。11月25日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尾正夫向井本提交了有关对常德进行细菌攻击的报告。根据这一报告,石

井部队的增田美保少校驾驶九七式轻型轰炸机于11月4日5时30分从机场起飞,6时50分抵达常德。报告指出:“大雾,降低H(高度)搜索,在H800附近有层云,故在1000米以下实施(由增田少校驾驶,一侧盒子未完全打开,在洞庭湖上将盒子投下。谷子36公斤,其后,由岛村参谋进行搜索。”谷子是疫蚤的代号。这就是说,将36公斤的疫蚤装在两侧盒子里,在常德上空1000米以下的高空投下,但一侧的盒子未打开,将其连同盒子一起丢在洞庭湖里。其后由岛村参谋进行搜索,报告指出:“6/11(11月6日)常德附近出现中毒流行(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附近撒布,凡触及者均引起严重中毒)。20/11前后,出现来势迅猛的‘鼠疫’流行,从各战区调集卫生材料。判定‘如果命中,肯定发病’”。12月2日,中国派遣军高级参谋宫野正年大校向井本提出报告:“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省‘鼠疫’极为猖獗”。对于上述鼠疫流行的观察,如下文所述,是不正确的;是出于主观愿望的夸大其词,但对于发生在11月20日前后的鼠疫流行却掌握得相当准确。

1941年11月4日晨5时许(日本军方的上述史料称,到达常德的时间为6时50分,时间上有出入),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上空的大雾中进行低空飞行,投下谷物、棉纸、真相不明的颗粒物。投下地点为常德城中心的关庙街、鸡鹅巷。下午5时警报解除。部分投下物被送至广德医院(长老派教会医院),进行显微镜检查。当时常德的医疗防疫机关,只有这座美国人教会办的拥有100张床位的广德医院,和有门诊部而没有住院设施的县卫生院;此外,还有红十字救护总队的第二中队驻在此地。最早接触到这一事件的是一位叫谭学华的中国医生和检查技师汪正宇。谭已经在广德医院工作七年,当时是副院长。

汪正宇于1942年曾这样写道:“民国30年11月4日清晨,一架敌机飞至常德上空,投下大量谷、麦等物。其后,防空指挥部、警察局和乡镇公所分别

将敌机投下的少量谷、麦一不含有跳蚤一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当时我们认为,敌机是在采取一种神经战术,用以恐吓我们,除此之外,可能性最大的是撒布传染性细菌。如果是撒布细菌,那将是鼠疫杆菌。其理由十分简单。第一,鼠疫是一种最为可怕的传染病,感染快,死亡率高。第二,投入的谷、麦都是老鼠的食物。第三,当地老鼠非常多,鼠疫易于传播。第四,据新闻报道称,敌人在浙江省的衢州等地投下了鼠疫杆菌,此次也有这种可能性。”于是汪正宇详细地记录了对投下物的检查方法。<sup>[4]</sup>

谭学华不仅对空投物进行了检查,而且还诊察了鼠疫患者,做了尸体解剖。目前已查明的,他留下了4份记录,即:1942年3月载于《湘雅医学院院刊》的《湖南常德鼠疫发现经过》<sup>[5]</sup>、1945年美国调查团的访问录、1950年2月5日《人民日报》的报道<sup>[6]</sup>、1972年的亲笔回忆录。作为最早接触该事件的当地医生,他的记录无疑是重要的。

谭学华于1945年接待了美国调查团,并对当年发生的事件提出了详细证言。美国的这次调查,是美国陆军军医官于1945年5月28日和5月29日随同“化学战军务(Chemical Warfare Service, CWS)”的使节团一起访问中国湖南常德的,目的是调查1941年11月4日日军撒布细菌事件,文件的标题为《在华中——湖南常德日本使用细菌武器》,报告人为吉登斯(J·R·Giddes)。<sup>[7]</sup>

### 三、发现鼠疫患者

撒布细菌的次日早上,即11月5日,常德县卫生院、防护团、国民党军警机关和广德医院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谭医生提出意见:病例可能是鼠疫,必须立即采取控制措施。他还提出了如下建议:(1)必须收集并销毁日本飞机投下的粮食;(2)必须致电省政府,请求派来鼠疫专家;(3)必须加强鼠疫防疫措施;(4)必须准备鼠疫患者用的隔离医院。”这是一个惊人的准确判断;是关于对策的建议。但是,上述提案虽然被传达给省卫生处,但是省里未准确地把握事态,因而未作出任何反应。“此次会议结束后,虽然向设在耒阳的省卫生处进行了传达,但没有得到答复”。<sup>[8]</sup>

随后开始出现鼠疫患者。“1941年11月10日接到报告,街道上发现大量死鼠,有数人患病,发高烧。”在有投下物的两个地点发现大量死鼠,但当时尚未对老鼠进行检查。

11月12日,住在细菌投下地点、关庙街的一名少女在母亲的陪同下来到广德医院。这名患者叫蔡桃儿,发病36小时后死亡,死因为疑似腺鼠疫。接着,13日死了聂述生,14日又死了徐老三。<sup>[9]</sup>

第四个患者蔡玉贞未运至医院,群众企图将因鼠疫而死亡的人私自埋葬。这是一个偶然发生的事例。该人死亡的第二天,即14日晨,红十字会医生肯特队长在去德山的路上拦住棺材,询问死因,因有鼠疫嫌疑,使开棺检查,查明为鼠疫。<sup>[10]</sup>

有报告说街头有死亡者,并传闻开始在常德市内蔓延。于是再次致电省卫生处。结果几名鼠疫专家被派往常德。陈文贵奉命组织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11月20日从设有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的贵州省贵阳出发,同月24日到达常德。陈文贵曾于1936年应国际联盟卫生部的邀请,赴印度的哈夫金研究所从事鼠疫研究,他是一位细菌学家,当时(1941年),是中国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检验学组主任和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检验指导员。

11月24日晚8时,陈文贵一行抵达常德,这时,第六名患者、28岁的男性龚操胜已死亡。次日晨,陈文贵在东门外用民房改建的隔离医院解剖了死者尸体,并进行了细菌培养和动物接种等实验,结果证明患者是因患真性腺鼠疫,由鼠疫菌引起败血性感染而死亡。陈文贵等还对以前5名死者的临床记录进行了研究,结果得出了均为疑似腺鼠疫的结论,并下令以后出现病人和死者必须报告和接受检查。陈文贵等人同驻常德的各防疫机关就鼠疫的处理方法进行了磋商,将鼠疫疫苗和磺胺噻唑分发给领导机关。其后由于未再发生鼠疫患者,陈文贵一行于12月2日离开常德,同月6日返回贵阳。12月12日提出了《陈文贵报告》。该报告是关于向常德撒布细菌问题的详细报告。<sup>[11]</sup>报告在结论中概括出以下两点:(1)从1941年11月11日到24日,在常德确实流行了腺鼠疫;(2)鼠疫的传染源是11月4日晨敌机(日本飞机)投下的鼠疫传染物体中存有的鼠疫传染性跳蚤。陈文贵对11月11日至24日间发生的上述6个病例,是否同11月4日晨日本飞机投下的谷类有关进行了核查,分析了当时可能发生鼠疫的三个原因。即:(1)在敌机投下谷类等物之前,常德是否发生鼠疫;(2)常德发生的鼠疫是否有可能是国内附近的流行地区传染而来的;(3)常德鼠疫是否是因敌机投下的被鼠疫菌污染的谷类引起的。根据上述情况证据,(1)(2)两项首先被否定,按照消去法确定为(3)。

陈文贵认为常德的鼠疫流行已经结束而离开常德,是一个错误估计。卫生署外籍专员伯力士代替陈文贵于1941年12月25日到达常德,开始进行调查研究,此后,伯力士在常德滞留了大约一年。伯力士到达后,立即确信鼠疫流行是由日军撒布细菌所引起的。1941年12月30日向卫生署署长金宝善提出了报告。<sup>[12]</sup>伯力士的报告显然是以陈文贵报告为基础,内容也类似,但也补充了不同意见。重要之处在于

于除情况证据外,还阐明了直接传染鼠疫的途径。后来由于战局紧张,伯力士曾一度离开常德,但1942年1月中旬,他又返回常德再次进行检查时发现了感染鼠疫菌的老鼠,其数字逐月不断增加。

#### 四、鼠疫的再次流行与传播

鼠疫患者及可疑者被收容在设于东门外的隔离医院中。最初的6名鼠疫患者死后全部被解剖,而后来却改变了这一作法,只解剖了部分患者尸体。这是因为全部解剖,对于医生而言不仅有感染的危险,而且会引起众怒。鼠疫患者的尸体最初是全部烧掉,后来“由于这种方法遭到人们的强烈反对而放弃,这类尸体不再焚烧,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埋葬在特别修建的公立墓地中”。

在最初的数月之内未成立检疫所,情报网也不够健全,估计有大量死者未被发现。红十字会医生肯特在路上发现的病例便是其中之一。“人们都逃避检疫和死后检查。为此,试图以一切手段将病人和死者隐藏起来。12月只发现两例。”其后,1942年1月为1人,2月没有发现,3月为2人,鼠疫患者虽然仅限于少数,但准确数字则不得而知。<sup>[13]</sup>其间,携带鼠疫菌的老鼠确实在不断增加,从而导致4月以后的鼠疫的爆发性流行。

1942年3月末,有报告说发现两名患者,均死亡。1942年4月检查了39名患者,其中明确显示为阳性者有20人,有怀疑者3人。自3月以来获得磺胺噻唑,开始为患者服用。在此之前,凡来到医院的患者全部死亡。这一情况使患者犹豫不决,迟迟不肯来医院就诊。4月11日以后,由于使用磺胺噻唑进行治疗,有5人痊愈出院。常德的鼠疫患者再次开始减少,5月有6人,6月有2人,7月只有1人。这样,第二次流行共有31名患者。<sup>[14]</sup>

根据1942年7月20日、常德第二次流行性结束后不久王诗恒写出的报告,从1941年11月12日至1942年6月30日期间,共检查1879只老鼠,3536只跳蚤。在被检查的1879只老鼠中,有415只呈阳性,139只疑似阳性。按月来看,从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31日共检查59只,1月只发现5只疫鼠。2月检查168只,发现疫鼠32只(感染率为19.0%)。而3月却急剧增加,在被检查的810只中,发现疫鼠181只。其后疫鼠迅速减少,5月发现29只,感染率为13.7%,6月为9只,感染率下降至3.5%。这表明了防疫活动的效果。

1942年5月,肺鼠疫蔓延至距常德县城东北22公里的桃源县漆家河莫林乡。以贩卖猪和布为生的

李佑生,5月4日在常德县城感染了鼠疫,潜返故乡,于10日死去。李佑生之妻于5月13日感染,19日死亡。以此为开端,护理他们的家属、来访的亲戚、邻居,以及护理后者的家属、探视者、参加葬礼的道士等相继感染,共死亡17人。<sup>[15]</sup>

距常德县城22公里的该县新德乡石公桥,1942年1月有两人从县城感染后死亡,此后没有再次发生。但10月27日又发现鼠疫患者,其后,截至11月24日共有35人发病,其中31人死亡。距石公桥5公里的广德乡镇德桥于11月20日发现两名死者,至25日共有9人死亡,有4人在隔离医院接受治疗。<sup>[16]</sup>此外,根据其他资料记载,石公桥的第一名患者是在10月15日发病,石公桥有29名、镇德桥有14名(包括疑似患者7名)死亡。

由于疫鼠的增加,伯力士担心1942年春将再次流行。因常德是水路交通要冲,印度跳蚤易于携带鼠疫菌移动,他指出,不仅常德县城,其邻近地区也十分重要,并在防疫计划中提出下列三条对策:(1)群众性卫生宣传,(2)群众接种,(3)捕鼠。<sup>[17]</sup>

实际上,在常德接受疫苗接种的不到人口的30%。1942年常德人口为62510人,军队4000人,共计66510人。其中,从1941年11月12日至翌年1942年5月接种的为19022人,占人口的28.6%。为了生效进行二次接种者为9403人,不足其半数。1942年3月有4568人接种,但未能防止4月的流行。于是,在所有的医疗机构、县城的六个城门、水路两个地点注射疫苗,到5月为止,也只不过达到28.6%。<sup>[18]</sup>

针对1942年4月常德县城鼠疫的再次流行,容启荣为参加湖南西部的鼠疫防治工作,于1942年4月26日离开重庆,5月10日到达常德视察了常德和桃源,在常德召开了防疫工作座谈会,参加者有有关机关和包括伯力士在内的20余人。5月下旬参加桃源的防疫工作,6月上旬湖南西部的鼠疫流行总算过去,他为参加广东、广西两省的霍乱防疫工作而离去,8月19日回到重庆。湖南西部的鼠疫防治工作记录,就是容启荣报告。

如上所述,常德市中心因1941年11月4日日军飞机投下鼠疫菌而首先发生患者,防疫工作的结果,使疫情得到控制,只有数人死亡,但是,受鼠疫感染的跳蚤和老鼠逐渐地由投放地向市内扩展,使得翌年春天爆发第二次流行。这还不足以体现细菌的令人恐怖之处,鼠疫还向周边的农村传播,桃源莫林乡和石公桥也出现了鼠疫。合计起来,常德鼠疫死亡超过百人<sup>[19]</sup>。但是,应注意的是,这些死者人数只是

医院和隔离所的数字,许多鼠疫患者死后家人都悄悄地埋葬,所以,揭示出来的数字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这在“日军细菌战历史澄清会”于1996年11月至1997年5月在常德进行的四次采访调查中很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看法。

注:

- [1]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mmission.
- [2] Peter Willams and David Wallace, Unit 731, The Japanese Army's Secret of Secrets, Hodder & Stoughton, 1989, pp. 249-250.
- [3] 以下有关日军对常德的细菌攻击,请见《井本日志》(吉见义明、伊香俊哉著《七三一部队和天皇、陆军中央》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8~34页)。
- [4] 收录在汪正宇《敌机于常德首次投掷物品检验经过》,原载重庆医药技术专科学校《医技通讯》,1942年12月。邢祁等编《辛巳劫难——1941年常德细菌战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
- [5] 《湖南常德发现鼠疫经过》(谭学华医师来函摘要)《湘雅医学院院刊》,1942年3月[湖南67-333]。
- [6] “湖南常德华德医院院长证明,日寇曾用飞机撒布鼠疫,常德地区很多同胞因此死亡。”《人民日报》1950年2月5日。
- [7] JJCA CHINA REPORT, (Subject: Japanese Use of BW at CH'ANGTE, Hunan Province), from J. R. Giddes to Harold Pride, 1945. 6. 28, Kunming R-713-ch-45, Secret, copy 4 of 5.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WO 188/680, 该报告全文共5页。关于谭学华等人的引文全部引自该报告。
- [8] 关于日本飞机向常德投下物体问题虽向重庆政府提出报告,但谭学华等提出要求派遣防疫人员问题却被忽视。根据谭学华1972年的回忆,卫生署的防疫队于11月16日才到达常德,湖南省的医疗防疫队到达常德已是18日。
- [9] 5名腺鼠疫患者的临床记录和尸体解剖记录,在陈文贵报告(1941年12月12日)的正文和附录中有详细记载(中央档案馆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年9月,第293~304页。)其英译本藏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伦敦的国家档案馆(PRO)。
- [10] 肯特在路上开棺检查,判定死者死于鼠疫一事,在上述美国报告(1945年)中无记载。该部分引自陈文贵报告附录中的第二例(《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04页)。肯特为奥地利人,当时任中国湖南省红十字会会长。
- [11] 中文版未记入报告者姓名,英文版在标题下写有 by Dr. Chen Wen Kwei, 由此可见报告人为陈文贵。如上所述,此份报告,后来收录在朝鲜战争时的上述国际

调查委员会(ISC)报告(一九五二年)中作为附录。

- [12] The Report from Dr. R. Politzer, Epidemiologist National Health Administration, to Dr. p. z. King, Director General, National Health Administration, Chungking, December 30 1941, (confidential).
- [13] 据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长容启荣的《防治湘西鼠疫经过报告书》(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见《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83~289页),常德第一次鼠疫流行的受害者,11月5人、12月2人、1月1人,共计8人。此处11月为5人,系因上述陈文贵报告中提出的6例患者中,通过检查未发现第5例(胡钟发)有疑似鼠疫菌,故未计算在内。此外,上述容启荣报告中的统计数字与后来的全国防疫联合办事处《近年国内鼠疫流行概况》(1948年10月11日)[第二历史档案馆372-764]的统计是一致的,但湖南省卫生处《湖南省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1943年4月)[湖南74-3-6(2)]所载《常德鼠疫逐月疫情统计表》,提出1941年11月的患者为21名,死者18名(但是,同容启荣报告不同的是未附上患者的姓名和病例)。
- [14] 引自《细菌战与毒气战》王诗恒报告。
- [15] 除李佑生之外,桃源感染肺鼠疫的原因如下:在16人中参与护理者5人、探病者5人、家庭内部传染3人、传染给邻居者2人,参加葬礼者1人。上述情况说明肺鼠疫是由人再传染给人的。老鼠的鼠疫传染率,从1942年4月至9月,桃源只有4%,其比例远远小于常德。此外,上述容启荣报告也列出了桃源鼠疫的患者表(《细菌战与毒气战》第290~291页),该表除有关感染及死亡情况不甚详尽外,未将道士计入,患者人数为16人。
- [16]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疫情旬报》1942年12月上旬,第26号(《细菌战与毒气战》第307页)。
- [17][18] 伯力士计划引自上述王诗恒报告第二部。
- [19] 根据记载有患者姓名、病例、感染原因等情况的患者名单,常德和桃源死于鼠疫的人数如下:常德县城区36名,桃源县莫林乡17名,常德县石公桥、镇德桥为43名(包括死于疑似鼠疫者),共计96名。此外,上述全国防疫联合办事处《近年国内鼠疫流行概况》的统计表,将常德和桃源的死者统计为89名,如果再加上镇德桥的7名疑似鼠疫死者,也是96人(但每月的数字有出入)。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湖南省鼠疫流行资料》(1973年),认为死者有100名,根据上述《湖南省防治常桃鼠疫工作报告》的统计表和本文记载,死者人数达117名。如上所述,根据不同资料,牺牲者人数也略有差异。总之,任何一种资料都未能掌握实际牺牲者的全部人数,这一点将是必须予以重视的。

(贾玉芹译,江田泉作过删节)

(责任编辑 叶建华)